

我的世博,最好的世博

曹景行



世博会上的“小白菜”

上海世博会十年过去了,每个参与者都留下自己的记忆,自己的世博。我的世博记录,就是全部七千多万人次进出中的一百几十次,是同几位小伙伴一起为腾讯和优酷拍摄制作的两百集视频,加上手边“秘藏”至今的几千张数码照片。还有三伏天烈日灼晒的正午酷热感觉,拍完一个馆赶往下一个馆,穿越毫无遮蔽的水泥路面。有一天《中国青年报》组织的大学生记者团要跟我一起采访,下午到了丹麦馆就有人中暑……

我的拍摄一般都是约上一位或者几位朋友,去他们最感兴趣的某个馆,边走边看边聊边拍。记得和德国汉堡来的老友关谦谦与夫人珮春来到德国馆,我们在嵌入地面的一块小铜牌前停住了,珮春解释说“这是德国街头的‘绊脚石’,记录下此地当年有人受到纳粹迫害,被抓去奥斯维辛或别的集中营杀害”。与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大雨中奔跑进入智利馆,我们看着1973年美国策动军事政变杀害总统阿连德的图片,谈了好多“如何直面历史”,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

年已八十的袁隆平老先生参观瑞典馆时,坚持要从三楼的管道滑下去,弄得旁边的年轻人好紧张。残疾运动员金晶带着我细细看了上海世博会特设的残疾人馆,领略处处都有的“生命阳光”。她告诉我,为残疾人开办的各种设施和器具,实际上都是为今天的健全人准备的,因为每个人日后都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我还旁观了她的“特技”——用一根拐杖挑起别人丢弃在路边的汽水罐,用手接住投入垃圾箱。

有时撞上适当机会马上就开机采访。4月3日是我们第一天进世博,下午约了郭君梅,上午拍摄世博清洁工和正在各个场馆内外收尾赶工的工人。中午登上世博轴,遇到几位铺路面的工人正在午餐,吃简单的盒饭。问他们世博开幕后有没有机会回来看看,或者带孩子来参观?他们好像还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这儿的活干完了马上就转赴南京,那儿的工程正急着等着他们过去。

大学生志愿者“小白菜”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跟他们打交道多了,一眼就可以分辨出谁是新上岗的,谁是有过一个多星期磨练的“老手”。印象最深的是采访马上就要下台回校的“小白菜”,好多位说不上几句话就两眼汪汪,这两个星期对他们来说终生难忘。一天傍晚,我遇见一队来自挪威的

年轻音乐家,一路向“小白菜”问路去演出场所。只听到其中一位感叹说“中国学生英语都这么好?”,弄得我这个大学老师心里甜滋滋的。

跟明星一起参观世博并不容易,尤其到了人山人海的时候。采访郭君梅那天距离开幕还早,到处都是空空的,我们干脆在中国馆的大台阶前拖来两把椅子坐着聊起来,背后的场景气派宏大,旁边是还没有完工的香港馆和澳门馆,还有只安装好下面一半的抽象雕塑《生生不息》,四周还用脚手架围着。陪董洁参观法国馆差点闹祸,她那一身大红裙子老远就引发轰动,警卫只能临时封路让我们快速通过直上顶楼。

世博会每天早上九点开门,参观者从各个方向的大门涌入,又是难得一见的情景。有一天我们提早进去,来到中国馆前的十字路口,就为了拍摄开门放

人的场面。那集视频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只听到轰隆隆的奔跑声由远而近,很快就到了面前,有的是全家大小,有的成双成对,也有坐手推车的老人……没什么人顾得上说话,都只是一个劲往前跑着。方向多是去中国馆。不时也会有人问我们“台湾馆怎么走?”“沙特馆在哪儿?”……

沙特馆前九个小时的排队,应该创下世博会的历史纪录。真心佩服参观者的耐心和决心,大太阳下或大雨倾盆时也不动摇,只会出现一长串没有尽头的五彩伞阵,实在壮观。据说得益的还有隔壁的印度馆。有人受不了沙特馆排队长的就改去印度馆,还有人排队当中抽空去那儿买个冰淇淋消暑解乏,结果让印度馆的冰淇淋摊位每天都大赚大赚。

实际上,世博会开幕后的最初半个月入园人数低于预期,5月5日才十多万,我们都看了心慌,尤其黄浦江两岸的园区更不见几个人影。一家餐馆的主人告诉我过了中午还没有一个人来光顾,担心全部投入会打水漂。但没过几天情况就渐渐有改变,入园人数很快上升到二三十万,大可放下心来。

时间久了有点经验,我们往往往看一眼四周就大致知道今天多少人入园参观。比如,过了三四十万就会有人进入草地去休息,意味着园区内的凳子已经不够用了。闭幕前几天的10月16日,全天人数接近一百一十多万,园区内只能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了。两天后整日暴雨,入园人数仍然超过九十万。中午时分,参观者都挤在世博轴高架桥下面避雨休息,看过去一片黑压压的,一时间排不走的雨水已经漫过脚面……

看到这样的场景,看到每个馆门口拿着“世博护照”排队盖章的人潮,我总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世博

会有如此热情?我每天都会问好多参观者从哪儿来,真是四面八方,来上海就是为了看世博,不少一家三代十来口一起,接连几天都入园参观。有些馆如中国馆非看不可,哪怕半夜起身到大门口排队拿预约券。既然参观了,图章一定要盖,不然怎么证明自己来过呢?想想挺感动的,中国人能够出国的比例其实不高,但这么多人都想看看这个世界!

世博会越到后期,越有一种世界各国一起狂欢的味道。我们好几次很晚才离开园区,因为晚上十点左右闭馆后还会有内部特别节目,尤其是馆与馆之间的联谊派对都会邀请其他国家人员同乐。一天我们拍下了新西兰馆与巴西馆的联欢,一边是毛利人,一边是印第安土著,都是天生的舞蹈家,全程热气腾腾,加上还有两国的美食助兴。传闻世博期间发展出好多对跨国恋人,只是不知后来如何。

不过,到快闭幕的那几天欢乐气氛消失了,代之以惜别的惆怅。半年其实很短,好不容易走上轨道,好不容易越来越融洽,突然发现就要分手了。最后我都不敢再去拍摄,因为见到的人一聊就想哭,弄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这就是我的世博,最好的世博,我不相信过去或未来还有哪届世博会能比得上。何况还听了意大利电影配乐曲木原、时年82岁的莫里康亲自前来指挥他的作品音乐会;还有谭盾的音乐会、比利时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还有每天看不完的大小小表演,把世界文化艺术都放到了我们面前,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想象。有此经历,幸运啊!唯一可惜的是十年来参与者都分散四方,带走记忆,没有机会多听听他们的精彩。



冲动(丙烯)谭平



上海英语及其前身

顾灼

近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错综复杂,关于贸易、外交、教育、思想等方面,学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两次鸦片战争更是研究的焦点。而语言(英语)问题却甚少有人关注,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要有人员交往,就存在语言接触。1860年代中国人开始学习正规的英语之前,中英交往的主要语言形态有三种:早期的澳门葡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广东英语、19世纪中叶后的上海英语。

据史料记载,近代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人是葡萄牙殖民者,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们强行上岸租占了澳门。为了生活和做生意的需要,他们必须与当地进行语言交往,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中西混合语——“澳门葡语”。无论发音还是用法,它和真正的葡语都相去甚远,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这一葡语和汉语的大杂烩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广东沿海商业交往的通用语,早期来华的英国商船也不例外,只能依靠懂得澳门葡语的中国通事才能进行贸易。

此后取代澳门葡语的广东英语同样是一种大杂烩——英语和汉语的大杂烩。英国第一艘商船到达中国在明崇祯八年(1635),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加,东印度公司于1715年建立了广州商馆,广东英语大致就在这段时期应运而生,此后这一语言伴随着英国在中西贸易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而不断扩大影响。作为英语

的一种特殊的变体,广东英语先在华南一带流行,以广州、澳门、香港为中心,到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开始盛行于上海外国商馆集中的洋泾浜,遂称“上海英语”或“上海洋泾浜英语”。这两种中国式英语的共同特点是句法简单,词汇量小(全部词汇不超过700个),发音用中文方式,差别在于一个用粤音,一个用吴音。典型的广东英语如“希”(he)、“哥”(go);典型的上海英语如“赫士勃”(husband)、“摩登”(modern)。

发明这种语言的乃是所谓中国通事。广义的通事包括和英国人打交道的中方买办、掮客、职员、仆役等。他们说的语言虽然蹩脚——常被称为“破碎英语”(broken English),却在中国沿海贸易中使用了近两百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通事出身底层,无力也无心学习正规英语,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人因畏难而不愿意学习英语,宁可俯就这种中国式英语。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刚到中国的英国人听不懂也瞧不起广东英语或上海英语,但为了做生意却不得不放下架子学起来,并在与中国人的日常和贸易交往中熟练使用。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学汉语的环境很不理想,不仅教材稀少,拜师更是困难,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授洋人汉语,否则有杀头的危险。所以直到19世纪30年代,真正懂汉语的英国人大概只

有两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和德庇时(John Davis,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高级职员,后成为香港第二任总督)。但学习广东英语却没有任何限制,为了迅速掌握这一技能,相关教材应运而生,如《华英通语》《夷音辑要》《红毛通用番话》等。不过这些当年并不稀罕的小册子,现在则作为珍藏,只能在世界上几个顶级图书馆才能得以一见。据见过的专家介绍,《红毛通用番话》虽然号称最早的广东英语字典(16页,收字约四百个),但整册不见一个英文符号,所有词语均以繁体汉字与广东土语谐音相对应,比如汉字“一”标音为“温”(即英语的“one”)。这样的发音固然便于记忆,但滑稽可笑之处不难发现。

上海开埠后,最早做翻译的都是广东人,他们跟随第一批由广州迁至上海的洋行买办而来,被称为“露天通事”,最初大约四十人,正是他们把广东英语带到了上海。稍后宁波等地的浙江丝绸商人也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他们慢慢开始用自己家乡的发音方式来说英语,于是使用吴语音系的上海英语开始产生,并逐渐取代了广东英语。1860年他们自筹资金,出版了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语注解》(后来多次重印),不仅开创了上海英语书面学习材料的先河,也创造了这一语言更加固定化。

研究上海英语以及此前的广东英

语、澳门葡语,最大的难点在于中文资料稀缺,本来中国人就不太留心记录外国的事情,加上中国通事完全处于传统史学的视线之外。这应当是国内学者少有人涉足这一课题的原因。除了少量中文教材可资利用,必须广泛挖掘外文资料和底层史料。比如关于广东英语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安森(George Anson)1748年的航海日志中,比较完整的一则记录出自1762年诺伯(Charles F. Noble)的笔下,他用接近原话发音的单词摹写法记下了多个句子,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一语言的最初面目,其中两句是这样的:

Carei grandi hola? (你要大个的吗?)
He no cari China man's Joss, bap oter Joss. (他不敢中国的神,他有自己的神。)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广东英语的一些显著特点:两句话中的动词 carei、cari 都是 carry (携带)的意思,体现了特点——可以携带人、事物,也可以“携带”宗教信仰。发音方面,双辅音弱化为单辅音 other-oter。语法同样体现了简化的原则,第一个疑问句将动词直接挪到句子的最前面,省却了助动词 do 以及相关的人称与时态,且同时省略了主语。规范的表达应该是 Do you want to carry a big (one)? 第二句则简化了否定词,直接用 no 前置于动词,而不是 does not 或 did not——所有人称与时态都可以用“no+动词”的固定方式来表达。这些特点都被上海英语所继承,唯一的差异只在于发音方式,但在弱化和缩减英语多音节为汉语单音节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1863年,上海建立了广方言馆,此后其他公私外语学校也不断涌现,学习正规英语已经有了正常的渠道,但上海英语仍然大行其道,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可知语言接触背后存在着历史推动力,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将大有可为。

春天是剑桥多么好的季节。太阳暖暖地照下来,常常一整天,到处都沐浴在一片明亮的橘色光芒里。抬头望去,天空中除了偶尔吹过去的云,只是一顷透明的蓝。风还是大,但风里多了草叶和花的清香。白天明显变长了——傍晚六七点,若在冬天里,早已黑透,现在恰是夕阳西斜、熏风拂面的时光。雏菊像活泼俏皮的小姑娘,顶着花帽子,叽叽喳喳聚在各处。华兹华斯诗里的黄水仙,从田野上、花圃里、绿草掩映的小径边,一小丛一小丛地冒出来,在风里摇曳着金色铃铛般的花朵。白色和粉色的花,分不清是樱花、梨花还是别的花,一树树地开,软似的花瓣撒到空中、地上、行路的人头上肩上。

那天去丘吉尔学院赴约,走过一段熟悉的幽静小路,路旁一大树雪白的花,开得纷纷纍纍。一个骑单车经过的少年,在疾行中,忍不住从车座上站起来,高举着手,伸进头顶掠过的一大丛花枝里去。我也忍不住向迎面走过的一位女士打听那树花的名字。她高高兴地停下来与我闲聊。这,大概是黑刺李的花吧,她一面说着,一面走到树边上,就着开在低处的一枝花,数了数花瓣,又仔细将枝条打量一番,告诉我,看花瓣的数量和花序,这应该就是黑刺李的花。那么,我是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吗?我笑说。她也笑了。我们就在这飘浮着淡淡花香的树丛中,高高兴兴地告别。

还有雪滴花,起初我以为是水仙的另一种。一丛一丛,吊铃似的洁白花朵,开在葱绿的茎叶中央,又都羞涩地垂向地面。朋友告诉我它的名字, snowdrop, 雪滴。真是浪漫之名。坐在丘吉尔学院的餐厅里,乔森还有他介绍相识的另一位朋友乔纳森一边午餐,一边闲聊。乔纳森是丘吉尔学院的入学导师,也是儿童文学研究专家。他是威尔士人,风趣幽默,热情爽朗。我们谈儿童文学,谈方言文化,又谈到美国的选举。太阳光从通往餐厅楼梯的大玻璃窗直照进来,倾泻在入口,暖意融融。用完餐,我们踩着闪闪的阳光,步出餐厅。

那样美妙的日子,好像就是昨天,又好像隔了一个世纪般的遥远。从三月中下旬起,英国实施社会疏远、继而宣布封锁政策后,这样好的景致,只能从窗里往外看。眼看着向阳的客厅窗口,不知名的灌木渐渐绽开粉色的花簇,而后谢了。铺在地面的绿色植被,一直以为是草,现在开出了蓝茵茵的小花,在窗下连片起伏地蔓延。蒲公英的绒球,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结在花丛中央。风吹过去,小绒伞们都纷纷扬扬,落到明年准备生根的土地里去。

现实生活却很难浪漫起来。网上社交群里,大家紧张地讨论着超市里缺货的情况。有伙伴刚从超市返回,发帖告知同伴,许多紧俏的食物买不到了。不少人把超市里随手拍的照片也贴出来,那些空荡荡的货架,因为自己熟悉的缘故,比新闻报道里看到的消息更加感受真切。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吧,货架上的鸡蛋都是空的。那是上下七八层的高大货架,过去几乎是满的。前路迷茫,大家只好互相鼓气取暖。有人在讨论群里愤愤地安慰大家:我不相信那些鸡不下蛋了。现实的无奈,笑得人进出眼泪。

越是焦虑紧张,越是感到这幽默的一笑,多么难得地珍贵。封锁初期,官方强烈建议,即便在家工作,应尽可能保持日常工作的常规程序。于是就有好闻人士一本正经地上传“乘地铁”的照片。“地铁”里自然是没有座位的,眼见各位君子同仁手握扶杆,挂着标配的耳机,认真站着刷手机。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握着自家浴室里隔水帘的挂杆,其认真逼真,令人哑然失笑。现在因为疫情被迫滞留在家,想起以往每天出工挤地铁的枯燥的日常,又有了一丝苦滋味,细辨起来,竟亦是亦苦亦甘。

乔担心我在这人地生不熟,疫情之下,生活和情绪都容易受挫,一再写信来说,如遇任何困难,随时联系我。此后,除了工作联系,每隔近两周,他都会传来一个 check in 邮件,问候并确认我和家人无恙。一切骤然停摆,对许多人来说,心理上确是一道坎。我跟纽卡斯尔大学的同行通信,得知封锁期间他们正在着手做的准备工作,无关专业,而是疫情期间团队内的心理支持。封锁以来,英国各地发生了若干因精神压力导致的家庭谋杀与自戕,其中一例就在剑桥边上,令人唏嘘。家庭暴力的案件数量也直线上升。

约翰逊宣布解封计划的第二天,我按照诊所网上的预约,去药店取药。这是近两个月来,我第一次离开小区,前往市中心。单车行过之处,田野已覆盖上厚厚的绿意。春花谢尽,换作一树树稠密的枝叶。骑过剑桥大学图书馆旁的林荫道,路两边的树荫,浓密得像要滴下绿来。一只褐色的短尾鹿,从一边栅栏钻出油亮的身子,悠悠踱过路面,消失在另一边的林子里。国王学院对面,往日喧嚣的露天市场,现在一片空荡,却从哪传来了说话和轻笑的声音。我忍不住侧头张望,看见了远处摆着蔬菜的三两摊位。木头架子上一点红绿橙黄,那样的小而零落,却那样让人感到愉快。

我脚踏单车,从这一点色彩的画里,愉快地穿过去……

赵霞

你会记得这个春天

时世艰难中,有人发明了简单而温暖的互助卡片,上面写着志愿者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自行打印,在社区传播,为了给恰好处在困境中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面对英国每日不断上升的确诊和死亡数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善意,在卡片底下承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在候”。社交媒体上,大家纷纷转发剑桥各家医院接收捐赠的链接。我曾带孩子去看急诊的艾登洛克医院,是剑桥城代表性的一座医院。记着那里医生护士的耐心和友善,我打开了医院网上捐赠的页面,费了一番周折,总算顺利走完捐赠流程,了却一桩心愿。

每每这样的时刻,文明与野蛮,启蒙与愚昧,大概总是空前醒目地如影随形。纯粹为了宣泄莫名的愤懑,社区间一度出现了各种仇医行为。有医护人员因被认作与病毒有关的扩散者和传播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到莫名的暴力袭击。一些 NHS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工作人员只好选择着便服出门,也不敢佩戴工作证。还有护士遭到所在小区居民的仇视与驱逐。

但另外一半的故事是,年轻的护士清早去上班,一脚踏出门外,意外迎来邻居们热情的掌声和温暖的礼物。3月26日晚八点半,从王室、首相到普通民众,全英国人相约走向窗前、阳台、门廊,一起为坚守在前线的 NHS 系统医疗工作者鼓掌。那个晚上,我们站在客厅大开的窗前,也把手掌拍得通红。此后,这成了全英国每个礼拜四晚上八点的固定仪式。很快有人嫌手掌不够响,亮出各式助阵的“乐器”,从锣鼓喇叭到锅碗瓢盆,巴不得在静默了一个礼拜的街巷里,弄出最响亮的声音。

疫情当前,一己之“我”似乎太渺小,太脆弱,不得向“我们”借取更多的勇气和温暖。所以,当二战中生还的99岁老兵汤姆·摩尔握着自家浴室里隔水帘的挂杆,其认真逼真,令人哑然失笑。现在因为疫情被迫滞留在家,想起以往每天出工挤地铁的枯燥的日常,又有了一丝苦滋味,细辨起来,竟亦是亦苦亦甘。

乔担心我在这人地生不熟,疫情之下,生活和情绪都容易受挫,一再写信来说,如遇任何困难,随时联系我。此后,除了工作联系,每隔近两周,他都会传来一个 check in 邮件,问候并确认我和家人无恙。一切骤然停摆,对许多人来说,心理上确是一道坎。我跟纽卡斯尔大学的同行通信,得知封锁期间他们正在着手做的准备工作,无关专业,而是疫情期间团队内的心理支持。封锁以来,英国各地发生了若干因精神压力导致的家庭谋杀与自戕,其中一例就在剑桥边上,令人唏嘘。家庭暴力的案件数量也直线上升。

我脚踏单车,从这一点色彩的画里,愉快地穿过去……

2020年5月13日 于剑桥

